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文章

##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蔡 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报告把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提出加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新任务。理解党的二十大这一新表述和新要求,应该从供给侧与需求侧结合的视角,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层面,着眼于实现两者的良好结合。

从 2011 年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供给侧,需要着眼于提高生产率、转换经济增长动能,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率。中国总人口预计在 2022 年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这不仅将从供给侧进一步降低潜在增长率,也带来需求侧的崭新挑战。人口总量、年龄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抑制社会总需求的效应,需求因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迫切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 一、从投资回报率入手扩大投资需求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资本要素相对稀缺是发展的主要制约。同时,人口红利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因此,那时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处于世界高水平。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在资本相对稀缺程度降低的同时,人口红利消失也导致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律挣脱了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缰绳,开始发挥抑制经济增长的常态作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传统比较优势的式微也导致固守既有经营方向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日益感受到投资无利可图。可见,投资回报率下降是投资需求趋于羸弱的根本原因。

在整体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同时,产业间、行业间、企业间和区域间仍然存在投资回报率的差异。撇开其他因素,生产率上存在的这种差异导致投资回报率大异其趣。如何让真实的投资需求显现出来,发挥投资应有的拉动内需作用,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政策难题。对于如何挖掘投资需求潜力这个问题,需要从全方位的视角来认识,进而通过全面的改革予以解决。

更加合理、有效配置资金,整体提高资本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一个产业的份额是否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而趋于降低,一个行业是否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一个企业能否保持市场竞争力,并不应该由政策制定者说了算,经济学家也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产业和

行业的消长以及企业的去留,最终要在要素价格没有扭曲的条件下,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来决定。归根结底,投资需求来自于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则有赖于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提高。

只有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疏通要素流动和重组的渠道,营造创造性破坏环境,资金才能流向真正的需求者,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扩大投资需求。这就要求削峰填谷,改变资本配置的不均衡现象。在投资需求疲弱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了诸如宽松货币环境、产业政策性补贴和特惠贷款等手段,旨在刺激投资需求。

然而,银行信贷的发放和优惠政策的施予,无论是出于风险的考虑,还是从免责的角度考虑,往往导致资金向大企业、国有经济和政府大型项目倾斜,甚至鼓励这些领域接受并不需要的贷款,造成资金的闲置和浪费。与此相反,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和新创企业则始终处于贷款难、贷款贵、得不到足够政策支持的境地。这种状况同时是投资需求不足、资金配置效率不高和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制定和实施政策需要懂得:资源重新配置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也是需求合理扩大的潜力所在。

顺应发展阶段变化挖掘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潜力,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从需求特点上说,基础设施投资与市场主体的直接投资,既有一致的动因,也有不同的特点。相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求顺应发展阶段变化,按照经济增长的新需求进行调整。不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一种市场活动派生的需求,建设周期和回报周期都较长,更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常常被作为刺激经济的载体,因而易于成为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的领域。

根据这些特点,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至少需要在两点平衡关系上把握好分寸。首先,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与实体经济脱钩。更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都会对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即在优化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其次,从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仍然可以挖掘到独特的需求潜力。作为一种派生的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固然有赖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常态速度,然而,补齐现实中存在的基础设施短板,仍然是立竿见影的当下需求。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足够超前,以致需求潜力就相对有限了。为了避免高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前程度,以便看到该领域投资需求的潜力所在,我们可以利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9》的信息进行两点比较。<sup>①</sup> 首先,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整体排在第 28 位,其中由人口规模决定的市场规模排名第一。也就是说,基础设施这个支柱的排位还低于整体位次。其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结构上也不尽平衡。这个支柱被进一步区分为交通设施和公用设施,前者的世界排名高达第 24 位,而后者排名则低至第 65 位。可见,无论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要求,还是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的要求,都意味着对公用设施建设和投资的巨大需求。

## 二、从收入分配入手扩大居民消费

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深的时代,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将放慢,或者说受到自然的抑制。人口转变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所以,由此产生的削弱消费的作用力,总体上无法人为改变。然而,除了来自人口因素的直接效应之外,还有一些与人口间接相关的因素,以及与之关联度较低的

① Klaus Schwab (ed),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World Economic Forum, Geneva, Switzerland, p. 155.

因素,也具有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从这些因素着眼打破需求制约,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相关政策大有用武之地。

受到人口间接影响的消费制约因素被称为增长效应或收入效应。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来临,中国经济将在更大的基数和更高的水平上,以相对慢的速度增长。这个经济增长减速从两个方面降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一方面,经济增量的相对减小,直接限制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蛋糕规模。另一方面,较慢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也制约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幅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 GDP、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费,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三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和相互关系,总体上遵循相同的轨迹,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三者之间的同步性不尽相同。由这三个指标所表征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体上结束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特别是在大规模刺激政策效应消失后,中国经济增速便进入常态性的下行区间。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从此为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设置了天花板。

与此同时,自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减速期以来,经济、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增长同步性却有了明显的增强,表现为在对上述三个指标的增长率进行两两比较时,均可以发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例如,在 2011—2021 年,人均 GDP 增长率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0.913,居民收入增长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931,人均 GDP 增长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33。

与人口因素关联度较低的消费制约因素是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和经验都表明,处在不同收入分层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大相径庭。由于低收入人群尚有未予满足的消费需求。因此,他们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会把较大的比例用于消费,即具有较大的消费倾向。由于高收入人群已经难有尚未满足的普通消费需求,他们只会将收入增长的较小比例用于消费,即具有较小的消费倾向。由此可以推论:社会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消费扩大。因此,任何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可以产生扩大消费需求的效果。

上述结论获得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宿玉海等估算了中国不同收入群体在不同消费类型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即家庭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某种类型消费的增长百分点。计量结果显示,如果以低收入群体在生存型产品和服务上的消费倾向为 1,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则分别为 0.56 和 0.13;在享受型产品和服务上,三个收入组的消费倾向之比为 1:1.55:0.34,在发展型产品和服务上,三个收入组的消费倾向之比为 1:0.61:0.30。<sup>①</sup>

政策含义是:在无法通过逆转人口转变方向来遏止消费下行趋势的情况下,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实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是保持稳定乃至扩大消费的可靠源泉。

### 三、促进比较优势的转换和升级

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享有巨大的经济规模禀赋和边干边学的后发优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变革速度,在实现赶超的同时,也改写了比较优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 2007—2020 年,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重,总体保持在略高于 30% 的水平,同期美国的这一比重从 29.8% 显著地下降到 19.5%。在 2001—2020 年,研究开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

① 宿玉海、孙晓芹、李成友:《收入分配与异质性消费结构——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新测度》,《财经科学》2021 年第 9 期。

中国增长了 155.3%, 美国则仅增长了 30.3%, 全世界平均增长率为 26.7%。

保持和发挥这些优势,正是中国在继续参与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自身经济增长和产业变革的底气。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必然选择。2020 年,中国资本形成规模的世界占比为 28.6%,最终消费的世界占比为 13.1%,2021 年 GDP 的世界占比为 18.5%。也就是说,国内大循环的“大”字名不虚传,无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足够大的舞台。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归根结底在于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其中,生产率的提高与分享是轴心,可以把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逐一紧密地连接起来。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是提高生产率的途径;通过共享发展和绿色发展,可以在全体居民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不同代之间分享生产率;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新发展理念推动的高质量发展,也必然为更好地开放发展打下基础。纵观全球化的变化趋势,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来看,中国未来的开放需要适应两个趋势性变化。

第一是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以劳动力丰富这一要素比较优势立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变化,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劳动力成本显著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势必减弱。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也显著提升了中国产业的配套能力、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为适应贸易模式变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广义而言,这可以看作比较优势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是国际贸易的多极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抓住了全球化机遇,实现了较快经济增长,赢得了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这同时也意味着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国际经贸活动已经并将继续在多元化、多样化和多极化的框架内进行。中国在这个大变局中扮演着重要主角,主导和推动着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以中国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趋势为例,在 2001—2020 年,中国按现价美元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813.5%,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 230 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额的变异系数下降了 26.9%。

中国在上述格局变化中的主导地位 and 适应性转型,一直以来都是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步进行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也必然要求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和提升。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模式将在比较优势转换的前提下同时发生以下变化,都要求以高质量发展开创对外开放的更高水平和崭新境界。

一个变化方向是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趋势,逐步成为高端产品的出口国。当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时,比如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相对于劳动力,资本的稀缺程度下降,该国的比较优势就会更加接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逐渐远离劳动密集型产品。于是,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地位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无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比较优势的转换,以及产业在价值链的位置提升,贸易格局的重塑也就是水到渠成的。

另一个变化方向是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以规模经济获得比较优势和贸易利益。这是一种把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内外联动的扩大开放策略。与基于要素比较优势的贸易相比,基于生产率提高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在中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差异缩小的条件下,利用包括规模经济在内的其他差异继续开展国际贸易。同时,中国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恰恰对应着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差异性,可以成为中国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元化贸易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郭克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曾经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重申了这个政策取向,而且从原来的“必须”上升到“坚持”,彰显了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更大重视和更高要求,强调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着力点的长期战略思想。

### 一、为何要把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实体经济可以从广义和狭义来理解。广义的实体经济是与虚拟经济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为国民经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实体部门,而虚拟经济则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非实体部门。狭义的实体经济是指三次产业中的实体企业,是直接提供生产供给、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基础力量。党中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 1. 实体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基

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发展实体经济就是不断夯实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技术经济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共同特征在物质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要拥有强大的实体经济,而中国特色在发展道路方面的主要表现,则是使实体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基,立足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有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有利于走和平发展道路。

#### 2. 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体

经济稳定增长要以需求稳定增长为基础,只有实体经济发展才能得到需求扩大的稳定支撑,而虚拟经济或非实体经济的需求增长则是波动的。从实体经济与消费、投资的关系看,居民消费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由消费拉动的投资扩大和投资结构升级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这些基本需求拉动的实体经济具有稳定发展的条件,而非实体经济脱离了基本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短期内可能出现快速增长,但往往会出现大幅的波动。如具有金融属性的房地产、证券、古玩等虚拟资产投资带动的虚拟经济增长,就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大国,由基本需求拉动的实体经济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应主要依靠实体产业发展来推动,而不能寄希望于非实体产业的扩大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实体部门依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主体。

### 3. 实体经济是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依托

在一个经济体当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伴而生的,当经济发展到较高的阶段,虚拟经济的比重会相应上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成为引发金融风险的主要问题。如果实体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虚拟经济发展就具有必要的运行基础,就不会出现过多的资产泡沫,金融风险就处于可控的状态。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 20 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房地产泡沫,泡沫破裂可能引起局部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这种条件下,只有促进实体经济稳定运行和增长,才能使防范金融风险具有实业基础和经济依托,当出现房地产泡沫局部破裂的时候,金融部门能够从实体产业获得必要的生存力量,政府部门可以依靠实体经济应对初期的金融风险。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风险可能迅速蔓延和扩大,以至形成剧烈的局部冲击和全局影响。

## 二、正确认识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这准确地概括了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特别是指出了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其中受到影响较大的是实体经济中的中小微企业。

从需求收缩看,主要是内需增速及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2022 年前三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 3.9%,比疫情前的 2019 年同期增速 5.9% 下降 2 个百分点,比 2021 年同期下滑 1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内需增速下降的影响。2022 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5.9%,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只有 0.7%。从前两年的走势比较看,2019 年 GDP 增长 6.1%,其中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3.5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 1.9 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 0.7 个百分点,内需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 89%;而 2020—2021 年,GDP 年均增长 5.1%,其中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2.4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 1.6 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 1.2 个百分点,内需对 GDP 增长的贡献只有 65%;不考虑经济增速变化,后两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相对作用下降 24 个百分点。

从供给冲击看,主要是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循环受到冲击。一是部分重要产业核心部件供应受到限制,如电子芯片、汽车芯片的供给不同程度地受阻,影响了产业的运行、发展和升级。二是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如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带来了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国内煤炭、电力供给出现短期波动,对企业生产运行和增长产生冲击。三是部分原材料供给出现物流堵点、局部短缺和价格涨幅过大等问题,影响了区域性、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的循环关系。这些供给冲击的原因,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带来的阻碍,有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经济技术遏制打压的影响,也有一些地方搞运动式减少碳排放产生的不良反应,还有俄乌战争引起的国际供应链冲击。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供给冲击压力中,来自国内的供给冲击主要是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引起的,影响供应链的有效循环;来自国外的供给冲击主要表现为技术价格性干扰,影响供应链的可持续循环。

从预期转弱看,主要是市场预期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一是连续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困难加大,维持经营发展面临较大挑战,对前景产生了一定的消极观望情绪,发展信心不足特别是缺乏长期投资信心。二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高负债发展模式受到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冲击,部分开发商出现或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对市场带来连锁影响和涟漪效

应,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相关企业的投资发展信心。三是金融市场受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波动影响,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尤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面对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市场,顺周期观念和行有所上升,经营发展变得更加谨慎和保守。四是资本市场波动下行对投资者和上市公司都带来冲击,增加了市场上的不稳定因素,使许多市场主体的悲观预期上升,较大地影响了市场信心。

“三重压力”是如何形成的?未来将呈现什么样的走势?从理论上说,“三重压力”是我国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与前些年中央提出的“三期叠加”的基本特点一样,是由一定内在矛盾引发的阶段性挑战。必须看到,“三重压力”不只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压力,不只是疫情带来的短期性困难,而是我国中长期发展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将使需求收缩的压力持续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下行和需求收缩会相互影响,即经济增速下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会使经济继续下行。二是美国对我国经济技术的遏制打压可能使供给冲击中长期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是起步较晚、仍在爬坡的重点产业,许多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势必成为美国对我实施遏制打压的焦点,这将对我国技术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产生供给冲击,而且有长期化和波动加剧的趋势。三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应对外部冲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也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在我国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条件下,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仍将受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实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三重压力”,与发展质量不高的状况和特点也有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供给发展不能有效适应和引领市场需求。由于创新能力不强,实体企业的供给不能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不能有效满足新的消费需求,促进现实需求增长和潜在需求实现,一定程度上导致需求增速出现收缩问题。二是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存在一些短板制约,主要是一些核心关键技术依赖于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使部分重要产业链运行或供应链循环面临较强的制约,导致供给侧结构容易受到较大的冲击。三是实体企业对投资发展前景缺乏信心和动力,主要是部分中小微企业发展层次不高,对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不强,在短期内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情况下,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趋势缺乏把握能力,出现预期波动和减弱的问题。

### 三、坚持把着力点放在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坚持围绕这个首要任务和主题,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 1.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这是把稳定经济增长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的内在要求。通过扩大内需战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可以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and 环境,同时,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带动经济稳定增长。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是扩大居民消费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消费,以拉动投资稳定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已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多数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进入稳定期或低速增长期,只有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具有较大增长空间但受到

收入水平的限制。因此应当以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消费水平为政策着力点,多渠道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和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实体企业创新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 2.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布局,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依托和路径。要协调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系,大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要着力推进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和中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我国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工业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但现代化水平还不高,加快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应聚焦三个重点领域。一是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赶超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前沿,充分利用新的产业变革条件和空间,加快补齐我国高新技术和产业的短板。二是提升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推动先进装备制造业优先发展,积极发展高端技术装备、大型技术设备,大力提升装备制造技术水平并拓展高端装备国产化空间,为实体经济技术改造或转型提供重要支撑。三是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是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支撑、为技术研发创新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加快新基建有利于提升产业链水平和保障供应链安全。要加强政府投资力度和政策导向作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和市场化投资发展,全面提升新基建的范围、层次和质量,加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技术设施。

## 3.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部分,狭义的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产业经济(即数字产业化),广义的数字经济还包括运用数字技术改造的实体产业经济(即产业数字化)。从这个角度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通过数字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发展数字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二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或转型。目前,前一个方面发展速度很快,但所占比重仍相对较低;后一个方面发展速度较慢,但所占比重和发展空间很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重点在于发挥好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推动传统实体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且有利于促进实体产业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不同类型产业在数字化改造中的不同方向和特点,注重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各类实体企业市场机制调节下,有效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数字化改造模式、机制和路径。

(作者系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吴晓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丰富,对未来发展做出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到 2050 年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一)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做出了准确的阐释: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就如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既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肯定是高收入国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放在首位。

##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人均 GDP 或 GNI 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国际上,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倾向于用 GNI(国民总收入)这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对比发达国家人均 GNI,我国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一般认为,人均 GNI 应达到 12500 美元。有些国家的人均 GDP 或人均 GNI 指标虽然超过了人均 12500 美元的门槛,但也不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还有其他社会性指标,如环境、教育水平、医疗、人均预期寿命和法制水平等。把相关社会性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整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数值为 0~1 的人类发展指数。一般来说,人类发展指数超过 0.75 的国家,可以认为是发达国家。目前,全球共有 36 个国家被认定为发达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均超过 0.75,达到 0.8 及以上。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要把经济可持续增长放在首要位置,同时要向法制建设、文化发展、创新能力、教育程度、医疗水平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某一指标的改善或提高。

##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这样的经济基础应该具有充分的活力和竞争力,经济结构应该是多元化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能力很强。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为此,必须处理好财富的创造、分配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完善并优化相关制度。一是要保护并优化财富的创造机制,让财富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让可分配的“蛋糕”越来越大,这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二是完善体现公平的再分配制度,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正常生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三是形成有效的财富积累机制,保护人们的财产权,保障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资本来源。

为此必须完善法制,让社会有足够的安全感去创造和积累财富。有了有活力的财富创造、公

平的财富分配机制和安全的财富保障体系,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 (四)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现代化建设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相比还有差距;二是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走绿色发展之路;三是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四是大幅度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五是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美誉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 (五) 金融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金融发展提出了要求,即“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以及“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方面,金融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金融现代化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两者相辅相成。在多年改革的基础上,中国金融正在朝着现代金融体系的方向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关数据的变化说明了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2012年,中国GDP达到53.86万亿元,到2021年底达到了114万亿元,按照2022年前三季度的增速,预计全年中国GDP将达到118万亿元,经济规模10年间翻了一番多。在经济大幅增长的基础上,中国金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储蓄从2012年的40.5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91.5万亿元,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2012年M2是97.4万亿元,2022年9月到达262.66万亿元;2012年金融总资产187万亿元,2022年6月则增加到407万亿元;外汇储备的变化相对较小,一直保持在3万亿美元的安全线之上;2012年进出口总额24.42万亿美元,2021年达到39.09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略有下降,表明内需市场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12年沪深市场市值23万亿元,2022年9月底达到76万亿元,沪深市场加上上交所,上市公司数量突破5000家。

这一系列数据表明,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金融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相比,中国金融离现代金融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市场化程度较低,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有待提升。金融必须既要满足融资者对资金的需求,又要满足投资者日益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金融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多样化的资产选择和组合,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金融业态的多样性,提高金融效率,完善金融功能。

第二,大幅度提高金融科技水平。金融既要服务于大企业也要服务小微企业,信用甄别难的问题亟须解决。要利用金融科技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用甄别问题,扩大金融的服务面,防范金融风险。

第三,着力推动金融的开放,提升金融的国际化水平。重点是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推动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中,做出合理的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应是我们的战略选择。从经济意义上看,一个国家最具竞争力的标志主要体现在货币的国际化上,包括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份额和影响力。我们要坚定地走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让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博 阅